

日本唐代文学研究十家

蒋寅 主编

韩柳文学论

〔日〕松本肇 著

孙险峰 译

中华书局



日本唐代文学研究十家

蒋寅主编

韩柳文学论

〔日〕松本肇 著

孙险峰 译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柳文学论/(日)松本肇著;孙险峰译. —北京:中华书局,2014.1

(日本唐代文学研究十家/蒋寅主编)

ISBN 978-7-101-09587-6

I. 韩… II. ①松…②孙… III. 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唐代-文集 IV. 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05661号



书 名 韩柳文学论

著 者 [日]松本肇

译 者 孙险峰

主 编 蒋 寅

丛 书 名 日本唐代文学研究十家

责任编辑 孙文颖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1月北京第1版

201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4 $\frac{3}{4}$ 插页2 字数120千字

印 数 1-2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9587-6

定 价 20.00元

前言

蒋寅

这套丛书是十位日本学者唐代文学研究论著的荟萃,约略反映了日本学界中年一辈专家研究唐代诗文的重要成果。

三年前,我与同事张剑兄一起翻译川合康三教授的《终南山的变容》一书,常就日本的唐代文学研究进行一些交谈。正值王水照先生主编的《日本宋学六人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我收到老友高津孝和浅见洋二教授的赠书,欣忭之余又不免有点遗憾,觉得日本研究唐代文学的学者更多,成果也更密集,却没有这样的机会介绍给国内学界。张剑兄是个有心人,马上同学苑出版社郭强先生商谈,决定推出一套日本学者的唐代文学研究论著丛刊,嘱我组织稿子。这当然是个好事,我欣然从命,马上邀约我熟悉的学者,并请川合先生等资深教授参酌推荐,最后商定请松本肇教授等十位学者各自遴选自己的论文,编为一集,由学苑出版社出版一套日本学者唐代文学研究丛书。

这一倡议承蒙诸位先生慷慨应允,翻译、编辑工作很快就开始进行。正当我热切期待各位作者的书稿时,一个不幸的消息突然传来,郭强先生因病猝逝!我与郭强先生素昧平生,自项目开始以来,尚未谋面。乍闻噩耗,惊悼不已,更为他的英年早逝不胜惋惜。

学苑出版社在郭强先生的努力下,历年出版不少古典文学研究论著,对当今学术的发展卓有贡献。他的去世,无论对出版社对学界都是个很大的损失。他的工作是值得我们纪念的。

因郭强先生离去,我不得不为这套丛书的出版另外寻找出版社。幸而得到时任中华书局总编辑徐俊先生和汉学编辑室主任李晨光先生的支持,决定由中华书局出版这套丛书,这我和各位作者深感欣慰。

将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内学界,是我酝酿已久的夙愿。从三十年前开始研究唐诗,阅读松浦友久教授的《詩語の諸相》,我就不断受到日本学者论著的启发,萌生翻译、介绍日本唐诗研究成果的愿望。1984年初我翻译了松浦教授的《中国诗的性格》一文,发表于《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11辑,从此一发不可收,陆续翻译了三十篇日本学者的论文,除了几篇友人邀约的译稿,多数是自己研究所需的参考文献。阅读日本学者的论文,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了解海外汉学成果对于我们研究的必要。同事刘跃进研究员多年来曾反复提到古典文学界“补课”的话题,其中亟需补的一门课,就是海外汉学。中国古典文学早已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海外每年都有不同语种的研究著作出版,从不同的视角用不同的理论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问题。不了解这些成果,我们不仅会错过许多有益的启发、有价值的参考,甚至还可能出现课题撞车、重复劳作的结果。补海外汉学这门课,的确是刻不容缓的。

但要补海外汉学的课,又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许多国家、许多语种的研究著作,要去调查、介绍、翻译,这对外语能力、经费和时间精力都是很大的挑战。近年,海外汉学研究逐渐受到重视,出版了一些专业刊物和研究著作。但我们对海外汉学的关注,整体布局还很不均匀,对日本、美国和西欧关注较多,对俄国(苏联)、东欧、北美和其他地区则了解较少。西欧也只是英、德、

法、荷几国了解得多一点,其他国家我们还不太清楚有什么学者做出了什么成果。这种情形与当今信息社会的发展趋势是不相适应的,亟需改变。

就当今海外汉学的格局而言,日本汉学历来最受国内学界的关注。这不仅因为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交流便利,更主要的是日本学者的成果扎实细致,广受各国研究者的重视。欧美学者凡治汉学的,首先必学日语,阅读日本学者的论著。我接触到的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欧美学者,基本都懂日语,能看日语文献。作为中国学者,我们更不能不了解日本同行的工作。

日本在古代曾是中国文化的热心学习者、研究者,从奈良时代的遣唐使和留学生开始,日本的僧侣、留学生乃至商人来华,无不搜购大量的汉籍舶载回国,促进了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近代以来,中国国势衰弱,社会动荡,大量公私藏书流散市肆,日本汉学家来华游学,悉留意搜罗,满载而去。著名藏书家的藏书也成为日本财阀渔猎的目标,陆心源皕宋楼和董康诵芬室的藏书就分别被岩崎和大仓两家财团购去。丰富的汉籍收藏,为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典籍和古典文学提供了良好的文献条件,也保证了其研究课题的专门性和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当然,日本学者的研究更值得我们尊重的还是其专业精神。“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虽然我们常不免将日本汉学成果视为可资借鉴的利器,但许多日本学者,尤其是老一辈的汉学家,他们都是像欧洲学者研究希腊、罗马文化那样,怀着一种亲切的眷恋来研究中国文化的。这使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历来都投入最大的热情(也许只有明治以后的一段时期是个例外),他们对学问的虔诚和好学的天性,更足以保证其工作及业绩的高水准。西方汉学家素来重视日本学者的成果,不是没有道理的。当今新一代汉学家,虽然较老辈的治学立场已有所不同,更多地是将中国文学当作外

国文学来看待,但仍继承了日本传统汉学的专业精神,相比欧美汉学来,其学术特点是非常鲜明的。

与欧美那些疆域广袤的国家相比,日本国土狭窄,资源不足,近代以来一直以技术为立国之本,对新知识的反应和吸取极其敏捷。日本对外国的研究和了解,也明显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在日语里,信息一词的汉字写作“情报”,让人联想到军事和战争。日本学者做研究,确实就像是进行战争一般认真和精准,对与研究对象有关的任何信息都搜集得很完备。日本可能也是世界上翻译外国书籍最快、最多的国家,这使得日本学者总是能方便地掌握世界各国的学术动态,在较开放的视野下开展工作。而视野广阔,对别人的工作了解得清楚,就势必会限制自己的工作范围。就好像纪晓岚,学问有名的广博,同时人都奇怪他不著书,他说自己编四库全书,发现自己要说的前人都已说过了。事情就是这样,学问越深广,可能研究的课题就越细密,钱锺书先生便是个最好的例子。

我常感到,中国学者对日本汉学的议论往往流露出一种偏见,认为日本学者的论文选题狭小,行文短钉,注重资料荟集而疏于思理分析。这显然是对日本汉学了解太少的缘故。研究课题的具体和细化,是学术成熟和深入的标志。日本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虽不如我们多,但他们的著作因为用功专精和细致,常达到令人佩服的深度。尤其是国内学术研究中断的二十年间,他们孜孜不懈的工作积累了许多重要成果。即便是这套丛书的作者,许多论文也是在七八十年代发表的,那时国内的研究还处于复苏、起步的阶段,而他们所探讨的问题却已相当深入,可以说领先于中国学者许多年。我在《日本学者中国诗学论集》的前言里,曾提到过自己当时感觉到的国内中唐诗研究方面与日本的差距,以及从日本学者的论文中得到的启发,相信这套丛书仍会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唐代文学在中国,因为受到传统评价的影响,一向只有盛唐诗独领风骚,中唐相对来说不太为人重视。直到 80 年代以后,历史取向替代形而上学取向成为文学史研究的主潮,中唐文学研究才逐渐受到关注,蓬勃兴旺起来。而日本则不同,由于大诗人白居易与平安朝文学的特殊关系,以白居易为中心的中唐文学研究,一直就在唐代文学研究中占有醒目的位置。1990 年,由川合康三、松本肇等学者发起的“中唐文学会”成立,不仅团结了研究中唐文学的中青年学者,更改变了日本学术纵向延伸的学术传统,将一种与信息社会的特性相契合的学术运作方式带入了日本学术圈。这套丛书的作者大都是中唐文学会的成员,但他们的成果绝不只限于中唐文学研究,而且他们的学术风格和研究方法也是多样化的。

其中既有芳村弘道教授的传统文献学研究,也有深泽一幸、松原朗教授那种富有创意的新颖探索;既有松本肇、赤井益久教授的宏大议论,也有下定雅弘、斋藤茂教授的精微辨析,还有户崎哲彦教授那样的现地考察。这些论著,无论其选题立论之旨如何,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言之有物,论不虚发,绝无人云亦云、了无新意的论说。这是严肃的学术精神加严格的学术训练的结果,也是学术价值和学术水准的保证。有一点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学者的有些研究相当地生活化,与自己的生活情趣紧密结合。比如丸山茂教授研究白居易的日常生活与饮食习惯,就是中国学者较少注意的。另外,日本学者明显对自然名物感兴趣,这也许和他们中小学充分的自然知识教育有关。孔子论学《诗》的意义,不就有一条“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么?看看市川桃子教授对唐诗中花草果木的研究,就会感觉古典文学研究其实可以和我们的日常生活距离很近,但我们经常都忽略了这一点。

说起来,这十位作者都是我熟悉的朋友,除了松本肇教授去年已荣休,其他九位都是各大学的中坚教授、活跃于当今学界的中年

专家。多年来,阅读他们的论文成为我很好的学习机会,由熟悉他们的研究,进而了解了日本的学术。我很高兴有此机会,促成他们的论著在国内以中文出版。在此我要向各位作者和译者表示感谢,同时向中华书局和为这套丛书的出版付出努力的李晨光先生、孙文颖女士致以崇高的敬意。我相信我们都做了一件值得做的事。

2011年1月10日

目 录

上 编 韩门文学论

第一章 韩愈的诗——攻击性的变容	3
一 序	3
二 青春之梦	4
三 对恶之战	7
四 恶的种类	10
五 攻击性的变容	13
六 失败者的视点	17
第二章 孟郊的文学——把悲愁当快乐	27
一 序	27
二 贤者的处罚	28
三 把悲愁当快乐	31
四 恶意的文学	34
五 诗人的使命	37
第三章 贾岛的文学——废墟之美	42
一 序	42
二 自画像	42

三	废墟之美·····	43
四	患病之蝉·····	47
五	诗人的生活·····	49
六	小结·····	52

下 编 柳宗元论

第一章	败北之逆说——寓言论·····	57
一	对社会的愤慨·····	57
二	自我戒鉴·····	69
三	愚者的文学·····	71
四	理想和败北·····	77
第二章	自我处罚的文法·····	87
一	柳宗元的辨明(一)——《寄许京兆孟容书》·····	87
二	受难者群像·····	92
三	柳宗元的辨明(二)——《与杨京兆凭书》等·····	100
四	自责文学·····	105
五	刘禹锡的辨明·····	121
六	柳宗元的设论·····	130
后记	·····	142

上 编

韩门文学论

第一章 韩愈的诗——攻击性的变容

一 序

韩愈与白居易齐名,是中唐文坛上的代表人物。他拥有众多的门徒,并且形成了一个文学集团,在文学作品的创作上亦非常丰厚。但是也因此遭到了很多无端指责,比如他的门徒之一的李贺(字长吉),以避讳其父名的理由甚至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妨碍李贺考试的这只箭,一定是以韩愈为攻击目标放射的。虽然韩愈写了《讳辩》(《昌黎先生集》卷十二)一诗进行反击,但是却没有任何效果。其后李贺放弃了科举考试,他这时候的心境,在“长安有男儿,二十心已朽”(《赠陈商》,《李贺歌诗编》卷三)里,能够看到一位年轻人的内心深处刻写下的伤痕。人只要在复杂的人际关系里生存,如果不把敌人打倒,自己也会被打倒。如果说生存就是斗争,确实让人感到讨厌,可是要把人间攻击性的问题特写的话,也确实来自这样的地方。而且人对于现实社会与伦理相关的问题,只要能够用文学方式尝试它的价值,应该说攻击性也是可以表达的重要内容之一。韩愈的攻击性是以他两次被左迁(阳山令、潮州刺史)的变化过程为契机,通过寓言诗^①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本章以此为对象进行考察。

二 青春之梦

怪物

贞元八年(792),韩愈二十五岁进士及第。贞元九年(793),二十六岁的韩愈初次接受博学宏词科的考试。这年写的《应科目时与人书》(卷十八)这一书信的开头,就表达了一个充满理想和希望的年轻人那神魂里的英勇节奏。

天池之滨,大江之渍,曰有怪物焉。盖非常鳞凡介之品汇匹侔也。其得水,变化风雨上下于天不难也。

在这里他把自己比作非凡的“怪物”。可是这年的博学宏词科的考试以落榜宣告结束。可以说,他在向掌权者宣传自己的时候,这封书信之所以没能发挥效果,是因为他冲破了自我宣传的框架,过度地跳动青春狂妄脉搏的缘故。

光荣的鸟

贞元九年,韩愈的博学宏词科的考试落榜了,贞元十年(794)、贞元十一年(795)的考试也相继落榜。贞元十一年,他向当时的宰相(赵憬、贾耽、卢迈)三次(正月、二月、三月)上书(《上宰相书》《后十九日复上书》《后廿九日复上书》以上,卷十六),表明了自己的信念,但是并没有受到重视。《不遇时》(卷一《感二鸟赋》序文)即是一边流露出深深的叹息之情,一边描写一个失败者。他渡过潼关,在黄河岸边休息时,遇到了一群手提装有白乌鸦及白八哥的鸟笼,向首都的天子进献的人们。这番光景给二十八岁的韩愈沉重地打击。他在《感二鸟赋》的序文里这样写道:

今是鸟也，惟以羽毛之异，非有道德智谋，承顾问，替教化者。乃反得蒙采擢荐进，光耀如此。故为赋以自悼，且明夫遭时者，虽小善必达，不遭时者，累善无所容焉。

在批判只因羽毛颜色的变化（小善）的两只鸟，就可以被献给天子这种不合理的现实时，支撑韩愈的应该是看到自己“累善”的顽强的自负心。

盖上天之生余，亦有期于下地。

上天之所以生下我，是因为期待我在这个世间上有所作为。《感二鸟赋》所表达的是参加现实社会的志向，即是通过韩愈的失败感的“累善”这一自负，渐渐地逆转成一个上升的志向。

韩愈亲眼目睹了笼中的两只鸟，并投以强烈的愤满之词。在批评的里层，表现了自己也非常憧憬变成像笼中之鸟那样的精英。笼中——对于韩愈来说并不是象征压制自由的空间，而是象征被天子布满宠爱的光荣的空间。韩愈在元和五年（810）四十三岁的时候，作了一首称作《东都遇春》（卷四）的诗，其中这样写到：“譬如笼中鸟，仰给活性命”，可以说自嘲自己像“笼中鸟”是对他二十八岁那天真无瑕的体现吧！

理想主义者的方向

贞元十六年（800），韩愈三十三岁时写了一首题为《海水》（外集卷一）的诗，其中这样写道：

海有吞舟鲸，邓有垂天鹏。

苟非鳞羽大，荡薄不可能。

我鳞不盈寸，我羽不盈尺。

一木有余阴，一泉有余泽。

我将辞海水，濯鳞清冷池。

我将辞邓林，刷羽蒙笼枝。

海水非爱广，邓林非爱枝。

风波亦常事，鳞羽自不宜。

我鳞日已大，我羽日已修。

风波无所苦，还作鲸鹏游。

这是一首对未来期望的诗。把自己比喻为小鱼小鸟，可是辽阔的大海和邓林的风涛海浪不论何时都很猛烈，并不适应我的生存，暂时先离开吧！等到我的鳞和臂膀长大后，感觉不到风浪的痛苦时，再像鲸鱼和大鹏那样回来。贞元十二年(796)，韩愈担当汴州宣武节度使董晋的幕僚，贞元十五年(799)，担当徐州武宁节度使张建封的幕僚。钱仲联在《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一当中，引用清代方世举的注说到：“按此篇盖辞去徐州之时。海水、邓林以比建封。鱼鸟，自喻也”。韩愈把现实中渺小的自己，比喻像“我鳞不盈寸，我羽不盈尺”这样微不足道的时候，是对自己成为地方节度使的幕僚之境遇的自嘲，但是并不需要把海水、邓林与张建封相结合。特别是邓林，是夸父追日口渴而死后，丢弃的木杖变成的森林(《列子·汤问第五》)。与太阳奔跑者，即等于追求高尚的理想者之美。这一美好的理想主义者，也就是在现实世界里渺小的自我对未来高大的自画像(吞舟鲸、垂天鹏)，这与韩愈的梦想是一个共鸣吧！

那么，鱼鳞不足一寸的小鱼长成大鱼后，是否真能在大海里自由地游荡呢？答案是，否。据《赠侯喜》(卷三)的记载，贞元十七年(801)七月，韩愈与侯喜等门人去洛水钓鱼，可是一整天才钓到不